

功成而不居,名彰而身退,这,同样属于“布衣孙犁的办刊之道”!

## 孙犁的“建组”之道 ——重读孙犁系列随笔

## 生命的重托



灯  
下漫笔

北京  
侯军

编副刊,办杂志,除了编辑是主导者之外,还有必不可少的“两翼”:作者和读者。一个高明的编辑,一定会想方设法把这“两翼”打开,只有打开这“两翼”,你所办的副刊和杂志才能展翅飞翔。

孙犁无疑是一个高明的编辑,有思路,有宗旨,有定力,也有谋略。他是一个习惯于“谋而后动”的编辑。而一旦动起来,就要把事情做得很实,不浮不躁,有条不紊,先打基础,再建队伍,包括读者队伍和作者队伍。

孙犁建队伍,有一个“妙招儿”,说起来也不新鲜,就是组建“小组”(类似于当今的“建群”)。这个“妙招儿”,首创于冀中区的战争烽火中,后来又带进了大城市,可谓一路“建组”,屡见奇效,成为孙犁编辑实践中的重要一环。

1946年,孙犁接受冀中区党委的委派,创办《平原杂志》。编辑就是孙犁一人,是主编也是记者,是校对也管发行,总之是杂志的“总管”。一份白手起家的杂志,最需要建立的是读者队伍。于是,孙犁首先想到的是:要组建一个“读者小组”。在杂志出刊的第一期上,孙犁就写了一篇《〈平原杂志〉为组织读者小组启事》,文中说道:

“本杂志为广大人民服务,系统地介绍各种文化知识,丰富农村的文化生活。为了更有效的发挥这个目的,贯彻这种精神,我们希望本杂志的读者们,能在同村、同街、同机关、同学校的范围里,自动地组织‘平原读者小组’。读者小组和编者取得密切的通讯上的联系。它的任务是:按期研究讨论杂志的内容,并经读者小组的同志们的活动,组织附近的群众开讨论会,使杂志的内容,传播到不能直接阅读和不识字的群众中去。”(见《编辑笔记》,第4页)

从行文看,孙犁把杂志的“身段”放得很低,因为在彼时彼刻,冀中乡村中文盲还很多,识字的人较少。杂志要想在乡村站稳脚跟,盲目追求“高端路线”肯定不行。孙犁在讲清杂志的宗旨后,就组建读者小组提出了几条非常切合实际的做法,譬如“希望本杂志的读者们,能在同村、同街、同机关、同学校的范围里,自动地组织‘平原读者小组’。”还希望“使杂志的内容,传播到不能直接阅读和不识字的群众中去。”

如此“接地气”的文字,大概在古今中外办报办刊的各类启事中,都是极为罕见的。这体现着孙犁的编辑思想,即:“本杂志为广大人民服务”。这句话,说起来好像很普通,对读者也是就低不就高;但细细品味,就会发现,这其实是一个非常具有高度也相当有难度的要求。而孙犁组建这样“不择细流”的读者小组,显然是为培育杂志的目标读者“度身定制”的。

七十多年后的今天,《平原杂志》已很难见到,它的“读者小组”是如何组织活动的,它在当时起到的效果如何,也无从查考。孙犁自己也没有详细记述,就连这篇《启事》都是一位“犁迷”从旧报刊上抄录出来的。但是,作为编辑,孙犁先生组建“读者小组”的做法,却因这篇短短的《启事》,而存留在其漫长的编辑生涯中,成为一个可供“溯源”的标记。

进城以后,孙犁征尘未洗,就参与创办天津日报的《文艺周刊》。办报环境变了,所面对的读者群也变了。对于这时的报纸副刊来说,报纸发行、扩大读者,已然不是优先的选项,而迅速组建一支作者队伍,成为当务之急。于是,孙犁又着手组建“作者小组”——这既是以往组建读者小组的做法的延伸与活用,更是适应新环境快速培养新的作者队伍,从而扩大稿源的“方便法门”。

组建作者小组,不像组建读者小组那样需“广泛撒网”,广而告之,而是以点带面,重点吸收。当时参与《文艺周刊》组建作者小组的编辑张家珠,曾在《孙犁同志和业余作者》的文章中,回忆了孙犁组建作者小组的“详情”:“天津是一个工业城市,是工人集中的地方,那么培养、发展工人文学创作者,自然又是《文艺周刊》义不容辞的责任。……于是,在这样的历史背景下,天津日报文艺部所组织的以工人为主体的业余创作小组便应

运而生了,并逐步发展起来。这个业余写作小组成员的来源有这样几个方面:一个是从来稿中发现的作者,一个是从报社新闻部介绍过来的通讯员,再就是有关部门推荐的人选……负责具体工作的编辑,看完这些业余作者的稿件,能够利用的,便认真进行修改,然后分期分批送到孙犁同志那里做终审审定。”

显然,组建这个写作小组,稿件是“龙头”,发现人才则是关键。张家珠写道:“编辑还要把业余写作小组的活动情况、写作中出现的问题、稿件的质量和数量,等等,都一一向孙犁同志做出较为具体的汇报。每次汇报,孙犁同志都讲了许多很好的具体意见和具体要求。”

孙犁在五十年代曾写过一篇《论培养》,谈及培养新作者的问题,他是这样说的:“培养新的作者,当然有各种方式和机构。在目前,我觉得一个文艺刊物的编辑,实际上负着这方面的光荣的责任。我们的文艺刊物就像一个训练新角色的科班一样,许多小演员经常在我们的舞台上操演,有很多人初露头角了,有很多人已经接近业满出师。没有充分的发表作品的刊物,想发现很多作家是困难的。正像不设备舞台想得到演员一样。文艺刊物既是一块实际的园地,它就必须经常具备适当的土壤、雨水和气候。如果园丁不耐心,或是由于缺乏经验,气候有时不正常,肥料有时施得太多,有时施得太少,对于幼苗都不适宜。而且,培养一个新的作家,比培养一种植物困难得多,他不是一年一季就可以成功的东西。”(《孙犁文集》第四卷,第264页)而组建这个写作小组,正是他的这种想法在编辑实践中的应用。

孙犁先生当年的这些做法,如今已被学界称之为“布衣孙犁的办刊之道”,被写进了研究专著。其中一篇还对他组建“写作小组”有一段专门的论述:“孙犁本人还积极将周刊青年作者组成‘副刊写作小组’,亲临讲课。这些‘创作经验谈’有些整理后发表在周刊上,如1951年1月21日刊出的《作品的生活性和真实性》和1952年5月12日刊出的《怎样把我们的作品提高一步》。……这种优秀写作者的‘夫子自道’,对初学者极有教益。孙犁还先后邀请方纪、康濯等友人参与指导写作小组。”(张均著《中国当代文学报刊研究》之第三章:《天津日报》“文艺周刊”,第74页)

在孙犁和编辑们的默默耕耘和精心培育下,《文艺周刊》这块园地,生机勃勃,新苗茁壮,在当时的报纸副刊乃至文艺期刊中,异军突起,形成了一种风格独特的新气象。在张均的论文中写道:“在创刊后短短两三年内,《文艺周刊》就切切实实培养了一批优秀的年轻作家,《文艺周刊》的版面上,新人新作如雨后春笋般地不断涌现。青年作者如刘绍棠、从维熙、房树民、韩映山;工人作者如阿凤、董迺相、滕鸿涛、郑国藩……”(张均著《中国当代文学报刊研究》之第三章:《天津日报》“文艺周刊”,第68页)

这些文学新秀中,不少都曾是孙犁组建的“写作小组”的成员。而对孙犁先生而言,他始终都不认为这些新秀是自己培养的,他在晚年写了好几篇文章,一再申明:“人们常说,什么刊物,什么人,培养出了什么成名的作家,这是不合事实的。……刊物和编者,只能说起了一些帮忙助兴的作用,说是培养,恐怕是过重了些,是贪天之功,掠人之美。”(孙犁《成活的树苗》,《编辑笔记》,第63页。)

功成而不居,名彰而身退,这,同样属于“布衣孙犁的办刊之道”!

香  
瓣

响水  
解小玲

早晨上街买菜,一位陌生女士和我打招呼。我抬头注视她,大脑快速地搜索着“内存”,还是想不起来她是谁。她介绍自己:“我是叶宝宝的妈妈。”“叶宝宝?”我努力回忆着:“哦!想起来了。”当她提到叶宝宝的时候,我的记忆一下子被唤醒,那个早产儿,那个住院两个月的令人难忘的孩子……

时光追溯到上世纪九十年代,当时我在儿科上班。一个冬天的晚上,我值夜班,十点钟左右,妇产科打来电话要求紧急会诊。接电话后,医生立即前往,我备好抢救物品准备紧急抢救。不一会,医生带回来一个新生儿,孩子由一位年轻男子抱着。我顾不上多看,立即接过来放到抢救台上。医生边抢救患儿边下医嘱,吸痰、吸氧、洗胃、静脉用药、温箱保暖。孩子呼吸不规则,时不时要做心肺复苏,我们不停地忙着,时刻不离左右,丝毫不敢放松,抢救近两小时,孩子自主呼吸才算稳定。

这时候我才静下心来观察孩子,他体重不足两公斤,胎龄不到七个月,身体发育不成熟,鼻翼扇动,明显是一个早产儿,极低体重儿。凭在儿科的临床经验,这样的孩子要想成活,取得满意的治疗效果,绝不是一件容易的事。首先要过四个大关,第一呼吸关;第二感染关;第三体温关;第四喂养关,必须保证营养供给。

抢救完毕,医生开始向孩子父亲交待病情,说明病情危重,可能发生的后果,耗费的时间、精力、经济等未知情况。孩子的父亲,是一位瘦高个年轻人,二十几岁,眼里充满了无助与恐慌,除了他本人,家里没有其他人陪伴。那年我也二十多岁,看着和自己一般大的同龄人背负着如此沉重的压力,心中充满了怜悯。面对一个弱小的生命,作为医务人员,我们不想家长放弃,希望和我们配合。我和医生安慰他一定会竭尽所能医治孩子。在我们的安抚下,孩子的父亲慢慢平静下来,表示一定配合我们治疗。

对于孩子的治疗,我们一丝不苟,尽心尽力,专人护理。孩子出现肺出血时呼吸停止,满口是血,全科人不嫌脏不嫌累,一次次救治,锲而不舍。随着孩子体温的恒定,呼吸功能的恢复,四大难关一一渡过,终于把孩子从死亡线上拉回,康复出院。他们家里没有过多的积蓄,最后无力支付孩子的医疗费用。我们在主任的发动下,每人为孩子捐款五十元,帮着交清了所有的费用。出院那天,孩子的父母流着感激的泪水,泣不成声。那个年代,早产儿“肺出血”是较难治愈的病例,可我们成功了。社会关系里,医患关系是一种治疗关系,更是一种合作关系,信任关系。感谢自己的辛勤付出,更感谢叶宝宝父母对我们的信任与支持!

职场中有两种“德”,一种是师德,一种是医德,师者点亮灵魂,医者照护生命。“有时,去治愈;常常,去帮助;总是,去安慰。”这是医者的职责,只有肩负担当,才能不负生命的重托!



# 登瀛